

张庆熊 徐以骅 主编

基督教

学术

(第六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B978
20023
6

基督教

学术

(第六辑)

张庆熊
徐以骅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基督教学术. 第6辑, 圣经的翻译与诠释 / 徐以骅主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8
ISBN 978 - 7 - 5325 - 5001 - 2

I. 基... II. 徐... III. ①基督教—研究②圣经—研究
IV. B978 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7809 号

基督教学术 (第6辑)

张庆熊 徐以骅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212,000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300

ISBN 978 - 7 - 5325 - 5001 - 2

B · 639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顾 问:沈德溶

主 编:张庆熊 徐以骅

学术秘书:刘平、张湛、陈果(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基督教学术》学术委员会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志成(浙江大学哲学系)

王忠欣(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

李天纲(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李向平(上海大学宗教与和平研究中心)

杨庆球(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

张庆熊(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罗伟虹(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徐以骅(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陶飞亚(上海大学人文学院)

顾卫民(上海大学人文学院)

黄颂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学报》编辑部)

谢文郁(关岛大学哲学系)

第六辑序言

本辑《基督教学术》以《圣经》的翻译和诠释为专题,其中大部分文章选自2006年6月8日至10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的“经典翻译与诠释”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五十周年系庆系列活动之一。来自国内与美国、新加坡等地的近五十名中外学者参加了会议,共计宣读论文35篇。现收入本辑的相关论文共计17篇。

经典的翻译和诠释是推动人类文明传布和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全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文明是拥有文化经典的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是其中的佼佼者。这四大文明大约都在公元前六百年至前五百年开始形成以文字形式记载的文化经典。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把这一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因为自从这个时代起世界文明的基本类型已经划定,人类诸伟大文明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时代所确立的基准而发展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经典的建立起了重大作用。这些经典成为相关文明的指路灯,发挥了价值导向和知识导向的重要功能。

诠释是文化生命的动力。诠释一方面延续了文化的生命,另一方面更新了文化的生命。没有诠释,我们不能理解古代的文化经典。社会在变化,语言在变化,人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变化,所以读者势必通过注解才能理解古代的文本。一个研究古代

文献的高手不是不通过注解就能理解古人的文本,而是能通过比较各家的注解找到他所认为的最合情合理的注解,在此基础上达到理解并有所发挥。因此,为文化的经典作注,不仅为了理解,而且为了开导。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解决新的问题,推动新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对文化经典的创造性的诠释,推陈出新,焕发新的生命力。

翻译在文化的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为了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我们不仅要了解西方最新的科学理论和学术思想发展的成果,而且还要了解这些科学理论和学术思想的文化根源。研究西方的文化经典,其中《圣经》不可或缺,它对于把握西方人思考问题和指导他们行动的总根子特别重要。本辑《基督教学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编辑的。

上述“经典翻译与诠释”会议得到美国硅谷橡子园及上海张江橡子园科技园区投资人王大成先生的经费资助,本刊的出版也一直得到国际科技教育服务机构(Professional & Education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的经费支持,在此,我们谨代表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和本刊学术委员会表示诚挚的谢意!

复旦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张庆熊 徐以骅

2007年6月25日

目 录

《圣经》的中文翻译和道在汉语语境中的展开	张庆熊	1
《圣经》文本源流略考(纲要)	王新生	13
《圣经》在中国道成肉身的 1370 年(635—2005 年)	刘 平	43
历史诠释与生命转化——从宋儒到蒂利希	温伟耀	57
文本、读者、处境 ——初探全球化处境对《圣经》诠释的挑战	谢品然	86
从伯多禄到彼得再到伯铎 ——《圣经》诠释中的“信达雅”原则	赵建敏	108
麦克斯·缪勒与“译名之争”	朱东华	121
《圣经》——一本天书	高鲁冀	138
律法与福音的真正区 别 ... (美)克莱格·毛里陶利斯(Craig Molitoris)夏 徽译		147
十架与莲花	刘华德	157
跨文化视野下的寓意解经法 ——斐洛的解经方法研究	章雪富	181
“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传道者的 “语言辩证法”	梁 慧	196

东正教视野下的《圣经》和圣传	马寅卯 217
历史逻辑研究与《圣经》	查常平 233
浅谈《约伯记》的几个问题	钟志邦 243
《圣经》是习西方语言最好的工具	王大成 254
为什么,耶稣如此言语?	陈 果 260

CONTENT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Bib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o in Chinese context	Zhang Qingxiong
The sketchy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Holy Bible's sources (outline)	Wang Xinsheng
The 1370 years of the Holy Bible's incarnation in China(635—2005)	Liu Ping
The explan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fe—from the Confucianism of Song Dynasty to Paul Tilich	Wen Weiyao
Texts, readers and contexts	Xie Pinran
From 伯多禄 to 彼得 and then to 伯铎	Zhao Jianmin
Marx Muller and the controversy of translation	Zhu Donghua
The Holy Bible—a book from Heaven	Gao Luji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laws and the gospels ...	Craig Molitoris
The cross and the lotus	Liu Huade
The explanation of the Holy Bible through its implied meanings on the standpoint of the cross-culture—the research on Philo's in- terpretive method of the Holy Bible	Zhang Xuefu
“Who knows what is good to him?”—Derrida's theory of deconstruc-	

tion and the missionarries' "dialectics of language"

..... Liang Hui

The Holy Bible and the holy preach in the view of the

East-orthodox Church Ma Yinmao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ical logics and the Holy Bible

..... Zha Changping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book of < Job > Zhong Zhibang

The Holy Bible: the best tool we can find to learn the

western languages well Wang Dacheng

Why did Jesus speak like that? Chen Guo

《圣经》的中文翻译和道在汉语语境中的展开

张庆熊

—

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交往的历史，远的可以追溯到唐代，但真正对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影响的还是近两百年的事情。约两百年前马礼逊和马殊曼发起的中文《圣经》全译本的翻译工作，不可不谓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本文不想对马礼逊和马殊曼等传教士的生平作评价，而想从语言学的观点出发，就包括《圣经》在内的经典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神学建设中的意义谈点看法。

语言本身就是“道”。圣言居住在人言中，圣灵居住在人的生活中。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也生活在语言中；语言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和语言中领悟道。道在全世界各国的语言中展开，汉语神学是道在汉语语境中的展开。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展开的历史。

按照现代的语言学理论，语言不能脱离生活形式，语言本身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生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

的。要理解一种语言,必须结合与此相关的生活形式。与我们的生活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语言,是唯一能被我们理解的语言。科学的语言、哲学的语言、神学的语言、数学乃至各种形式化的人工语言归根到底是以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的日常语言为基础的。语言不仅是我们描述世界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手段,而且也是我们认识世界和组织自己思想的框架。

过去的语言学家常把语言设想为描述世界的工具。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用语言描述它们,语言是事实的图画。^①在当代语言哲学中,这种语言观被认为是片面的,因为显然语言不仅描述世界,而且也是我们交流思想的媒介。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批判了他早期所持的语言的图画理论的观点,论证语言不仅有描述的用法,而且还有诸如命令、道歉、致意等多种多样的用法。维特根斯坦还论证,语言的用法是与语言的规则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规则是在语言活动中形成和被遵守的。语言活动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只有参与到语言活动及其相关的生活形式中去,我们才能真正学会一种语言的规则和理解该种语言。^②

我觉得这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圣经》的翻译和理解。有的神学家主张把《圣经》的翻译和理解与其他文本的翻译和理解区分开来,因为《圣经》是借助圣灵写成的,圣灵会帮助信徒达成统一的翻译和理解,“七十子本”的翻译就是一例。我相信圣灵是会帮助我们,但我不相信圣灵对我们的帮助如同魔力一般。按照我自己阅读《圣经》的体会,圣灵对人的理解的帮助发生在人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认认真真阅读《圣经》,反思其中的含义和教训以及展望未来和指导自己行为的平实的过程中。我想我们作为普通的人就用人所赋有的平凡理性来谈问题。其实,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的《圣经》译本,“七十子本”的翻译不过是传说而已。甚至《圣经》本身也是在历史的过程中编纂起来的,究竟哪些属于正典,哪

些不属于正典,也没有最后的定论,如天主教的《圣经》《旧约》就比新教的多了七篇。我不懂希伯来文,但对照犹太教徒使用的希伯来《圣经》的一个英译本和基督教使用的《圣经》《旧约》的一个英译本,就发现不少差异,有些经文译名甚至还涉及到关键的教义问题。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本《圣经》与用现代德语翻译的德文本《圣经》有差异,这是语言的发展使然;犹太神学家罗森茨瓦格和马丁·布伯合译的《圣经》与马丁·路德译的《圣经》有差异,这不仅是语言演化的问题,而且还有神学理解上的问题。

中文《圣经》翻译更呈现多样性,迄今有据可查者即达百余种,其中包括汉语文言文、白话文、方言译本等。其翻译和传布的过程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1)由洋人翻译到中国人自己翻译,(2)由文言文本流行到白话文本流行。

最初,翻译工作几乎完全由外国传教士承担,至多让中国人做一点文字润色工作。从马礼逊的第一个中文《圣经》全译本(1807年始译,1823年在马六甲刻印出版全译本),到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行世,都是外国传教士按照他们对原文和中文的理解来翻译《圣经》。这种局面直到近几十年才有改观。现在《圣经》新译本的工作主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做。汉语的演变和《圣经》考古学的发展使《圣经》学者深感重译《圣经》的必要性,而现在这方面工作只有中国《圣经》学者自己才能胜任。现在,在国外的学者中很少能找到兼通中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的人,而中国学者的外文程度则普遍要高于外国学者的中文程度,这确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吕振中可谓开了一个中国人翻译整部《圣经》的头。他于1946年译成《新约》,于1970年译成《旧约》。由许牧世、周联华、骆维仁等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又有新的突破,他们于1975年完成《新约》,1979年完成《旧约》,其文体优美流畅,深受习惯于现代汉语的普通读者喜爱。在“和合本”基础上修订的

《圣经新译本》的工作由容保罗等 30 多位华人《圣经》学者承担,他们于 1976 年出版《新约全书新译本》,1992 年完成《旧约》,全本《新旧约新译本圣经》于 1992 年出版;该译本的改动虽然不多,但很多地方很关键。

西方传教士把《圣经》译成中文的功夫不可谓不深也。他们用深文理文、浅文理文、官话(白话文)三种文体翻译《圣经》。最初流行的“二马译本”(马礼逊译本和马殊曼译本)是用文言文(深文理文)写的,如:马礼逊将《约翰福音》1:1 译为“当始已有言而其言偕神。又其言为神”,马殊曼译为“原始维言。神同言。言即神也”,为适应普通读者的语言习惯,西方传教士继而又用浅文理文和白话文翻译《圣经》。作为他们译经工作的集大成者“和合本圣经”按原计划准备用深文理文、浅文理文、官话(白话文)三种语体来翻译,此所谓“《圣经》唯一,译本则三”。后来深文理文、浅文理文的译本合并为“文理和合译本”,它与“官话和合译本”同时于 1919 年定稿出版。时适五四运动推行白话文,一方面“官话和合译本”对白话文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白话文的地位的确立也使“官话和合译本”在诸《圣经》译本中脱颖而出。该译本多年来在中国各地广为流行,迄今仍是大陆及台港地区教会通用版本。1979 年后,在上海、南京多次影印重版。1989 年,在南京印行简体字横排本,至 1994 年发行量逾 1,000 万册。

正如中国佛学是随着翻译佛经开始的,中国的基督教神学也将随着翻译《圣经》和西方的经典神学著作而开始。当年佛教传入中国之时,译经工作最初也由印度和西域的僧人来做,后来转为以中国人为主进行。鸠摩罗什(Kumarajiva, 344—413)、真谛

(499—569)、玄奘(602—664)号称三大佛教译经家。相比而言,玄奘为后来者,而且他在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上很难说超过了前两位,但是玄奘开创了中国的法相唯识宗,而前两位译经师却没有在中国开创出一个佛教学派。究其原因,我想玄奘是带着中国人的母语意识来译梵文的经,而前两者是把梵文母语意识中的佛经理解转化为中文。翻译要忠于原文,但同时势必是一个解构—建构的创造性工作,玄奘以中文母语意识为底蕴翻译佛经,势必更多和更容易融入中国文化成分和中国的生活体验。这样,中国特色的佛教学派也就更容易产生出来。事实也是如此。当玄奘糅译唯识十大论宗的著作,造《成唯识论》时,带着他自己理解的中国的法相唯识论学派也就建立起来了。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1)传教,(2)判教,(3)立教。

佛教在中国传教的过程是一个外来文化植入中国和逐步被中国人理解的过程,它始于以印度和西域僧人为主的传教和译经,随后中国僧人逐步参与进去,并最终担当主角。

随着各种佛教经文翻译成中文,各种印度佛教门派在中国立脚,中国人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并开始探问究竟哪一种经文更加正确或妥当一些,哪一些教派更加正宗或优秀一些,也可能在肯定一切佛经皆为佛说的前提下对诸经的位次做一个安排,确定其对自己修行和研究的轻重缓急。据《唐高僧传》,唐太宗问隐士孙思邈:“佛经以何为大?”孙氏曰:“《华严经》为诸佛所尊大。”又问:“玄奘大师所译六百卷《大般若经》岂比不上六十卷《华严经》?”孙氏答:“《华严经》是阐明法界事事物物无穷的缘起相生并且又彼此圆融无碍的无上宝典。它包括一切佛法的法门,且于其中任一门中,都可演化出其数等同大千微尘数的无量经卷,而《大般若经》只是华严法界经中的一项法门而已。”唐太宗听了孙思邈

的话,于是受持了《华严经》。不论唐太宗是否真有与孙思邈的这样一段对话,但毫无疑问这表现出《华严经》拥护者的判教。判教不是听别人怎么说,而是自己做出某一决断。自己的决断要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对佛经的理解。中国人自己的判教决定了哪些印度的佛教宗派在中国被接纳和弘扬。并非所有传入中国的佛教宗派都能在中国扎根发展,事实上传布开来的并不多。

随着佛教逐步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也开始直接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认识佛教的实质。这时在思想上的表现形式不是引经据典地解释经文,而是直接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用自己的话来阐明佛理。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谈得上真正的中国佛学的诞生。《六祖坛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涌现出来的。在佛教中,把阐明对天地人生最基本的立场和观点的文章称为“经”,把对这些基本观点和立场加以论证的文章称为“论”。在《六祖坛经》之前中国人写的佛学著作只有“论”而无“经”,《六祖坛经》的定名确实表明中国人自己意识到自己独特的佛学的出现。

我想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会经历类似于佛教的传教、判教和立教三个阶段,目前还处在传教和判教的阶段,还没有进入立教的阶段,还谈不上严格意义的中国神学。这两种传教间的差别当然是有的。如果说当年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持宏大开放的胸怀,常常主动邀请印度或西域僧人来华传教,那么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则与强权入侵相伴随。当年对佛教的主流态度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择其先后等次,而近代中国当权者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是对基督教持排斥态度,生怕基督教乱了中国的国体和人心。这种心态可能与近代中国人对自己国力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的自信心低下有关。随着近来中国国力的加强,中国学人对外来文化越来越持开放的态度。

以上谈到,《圣经》中译本的工作在过去主要由西方传教士来

做,而现在《圣经》新译本的工作已经主要由华人来承担了。还须补充的是,西方神学的翻译和介绍的工作在过去主要也是由西方传教士来做的,甚至有关西方新的哲学和社会观念的思潮,如社会主义的学说,最先也是由西方传教士译介的。对此事实,只要翻阅《万国公报》上的文章足以佐证。据说,康有为的新学知识就是在他进京赶考之前在上海四马路的书摊上偶见《万国公报》等西方传教士办的一些刊物而得启蒙。现在中国学者翻译西方神学和哲学著作的劲头堪与唐代翻译佛学著作的热潮相匹配,在中国书店里所能看到的西方神学和哲学著作的种类不亚于在欧美的书店的柜台上所陈列的,因为中国现在是把西方的这类著作从古到今一起翻译和出版,而西方书店里所看到的只是现在流行的那些书籍。中国佛教引以自豪的是中译大藏经比现在印度所存的原文典籍还要全。如此发展下去,中国的基督教神学的系列丛书将越出越全,也将会出现类似于佛教大藏经那样的基督教大藏经。

在中国大陆,中国的基督教学者和神学家还刚刚进入判教的阶段。有的喜欢存在主义神学,就更多地译介西方的存在主义的神学;有的喜欢后现代主义的神学,就更多地译介后现代主义神学;有的喜欢新正统派的神学和福音派的神学,就更多地译介新正统派和福音派的神学。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争论,甚至会指责对方过于保守或太自由主义乃至背离了基督教。

但是这样的判教还离建立自己的神学有一段距离。这样的判教虽然已有某些自己的看法,但是仍然在评判别人所建立的神学。只有当中国的基督教思想家意识到西方业已存在的神学学说不足以回答中国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不足以解释中国人自己的生活体验,因而努力在保持基督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建立自己的神学叙事和概念体系,从而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和对终极意义的追问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神学才会出现。当然,中国神学不一定